

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社会心理成因分析

邹兴平, 黄文韬, 冯晓晴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 社会思潮的孕育发展均依托较广范围内存在的社会心理, 面对当前网络传播语境下各种社会思潮变幻、更迭、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现象, 有必要从人性需求表达的媒介化延伸、思维方式的网络化同构、行为倾向的二元化呈现、情绪状态的极化表达四个方面, 深入考察研究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社会心理变迁与社会思潮形成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规律, 以增强社会思潮引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社会思潮; 网络传播; 社会心理;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D64; G206.2;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21)06-0062-07

DOI: 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6.009

The Sociopsychological Causes for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Thoughts

ZOU Xing-ping, HUANG Wen-tao, FENG Xiao-qi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oughts is based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that exists in a wide range.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ing, alternation and complex pluralism of various social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between socio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thoughts, both of which reflect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four aspects: the mediated extension for human needs expression, the networked assimilation of thinking styles, the dualistic presentation of behavioral tendencies, and the polarized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states, to strengthen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ding social thoughts.

Key words: social though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social psychology; thinking style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 现实世界的各类社会思潮齐聚网络空间, 互联网成为了社会思潮传播的主阵地, 各种思潮变幻更迭, 纷繁复杂, 使主流文化和价值

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和挑战。在网络媒介社会思潮多元化这一语境下, 社会治理要凝聚思想并形成共识最大公约数, 就有必要了解社会思潮作用于人的社会心理成因。社会心理作为人的

收稿日期: 2021-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KS066)

作者简介: 邹兴平(1968—), 男, 湖北监利人, 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黄文韬(1994—), 男, 湖南长沙人, 助教,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冯晓晴(1997—), 女,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主观世界对于社会生活现象的直觉反映,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生活的所思、所感、所盼^[1]。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研究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2]因此,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从人性需求、思维方式、行为倾向、情绪状态四个方面深入考察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社会心理变迁与社会思潮形成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把握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多元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社会思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动力泵”:人性需求表达的媒介化拓展

在网络媒介时代,有必要探寻社会思潮产生的多元化现象及其这一过程的社会心理发生发展机制。潘菽先生曾言,“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门主要科学……心理学的根本任务又是要科学地阐明人是什么,以求得对人的实质有充分的正确理解,所以,人的实质问题对心理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3]潘菽先生笔下“人的实质问题”在浙江大学刘华等人看来就是人性问题,并且,他们认为,人性问题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正是了解社会大众本质属性、本质需求的重要基点,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那么“人性需求”这一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就应是其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所谓人,实际上是一种以三重方式存在的生命体。当他们作为有生命的群体在自然界活动时,他们是自然存在物;当他们以社会(即相互交往)的方式进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自身的生产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存在物;而当他们

既能按照“物的尺度”(此即“自由的”)又能按照“内在的尺度”(此即“有意识的”)进行各种生产的时候,他们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应当承认,自从与动物告别以后,人便在生命的三重存在方式上提出了自己的需要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那么,媒介技术的出现和应用究竟使得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适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90年代所描绘的“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下人类生活的实然状态。互联网凭借其即时性、海量性、交互性等特征,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人类日益将自己搁置于互联网技术平台之上,并无法回避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干涉与影响,在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介社会环境中,人们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深谙现代媒介技术及其价值本质的数字化主体,人的数字化生存也必然会导致人的社会精神结构与社会心理向数字化与媒介化转型,从而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导致人本性需要的变迁,而催生出新的人性内涵与价值信仰。其一,与过去相比,人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个性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消费手段来看,网络媒介使线上生活成为线下生活的重要补充,既提供了消费便利,也使得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得到了手段上的有力支持。其二,与过去相比,人的社会交往有了极大的变化,突破了时空界限,延展了社会交往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人继续进行以往进行过的交往,并为这种交往继续制定出一系列旨在维护其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以规范个体的行为,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共享性、交互性、即时性和渗透性等特征,使交往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其三,与过去相比,人追求自由活动有了较大自觉性。在网络技术广泛适用的今天,尽管人在线下仍以惯常的方式进行着创

造活动,但媒介赋能使人们实现了智力和体能的极大超越,实现了对既有思维和逻辑悄然无声的变革。特别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生物识别等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开发和充分运用,更是以人造大脑的华丽炫技,将人的本质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自我意识、自由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

媒介社会语境下社会存在的变革使得人性需求表达在三重存在方式中得以拓展和延伸,为社会意识层面的社会思潮多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受众基础。在生产高度发达的网络媒介社会,它具有鲜明的虚幻性和隐匿性,使个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自由度越来越大,人性需求层面个人生活的个性化、多元化色彩变得越来越鲜明和强烈,从而影响行为主体在思想观念、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精神风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建构和选择。近年来,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科技本位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喧嚣尘上便是最好的明证。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充盈,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得到提升,对于物质生活品质的人性需要得到进一步拓展,追求消费带来的快感与体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理念逐渐流行,消费主义借势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消费价值的凸显和推崇,成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5]泛娱乐主义的兴起同样如此,“泛娱乐主义是在现代媒介、资本逻辑以及心理需求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出现的一种把娱乐作为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现象,它以超越娱乐底线的泛娱乐化倾向为主要形态,蕴含着将娱乐价值作为首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6]。具有“娱乐至上”“全民狂欢”等特质的泛娱乐化需求助长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凸显。在物质需求层面之外,精神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同样如此,人性需求的拓展同样为社会思潮的孕育、传播创造了条件。“佛系”“丧文化”“躺平”等网络热词出现并迅速流行开来,便体现了一种整

体的社会心态,真实反映了社会民众的心境状态、思想倾向;像自由主义的泛滥,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发难,新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等等。都是由于网络媒体的发展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为多元化的分众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一旦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或焦点问题出现,消极的、错误的社会思潮便可能以此进行编码,披上普世价值外衣,迎合当下部分民众的社会心理期待,以图达到分化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二、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润滑剂”:思维方式的网络化同构

人的思维方式是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心理特征的重要表征。网络不仅使人类的人性需求得以延伸,同样也促进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对此,只要回顾一下媒介发展史,就能得到确凿无疑的答案。比如,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人们离散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展。电视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从“阅文时代”转入“读图时代”,人们的视觉思维得以拓展,电视技术提供的画面清晰多彩,不仅使人们能直面各种事物的具体形态,而且能使他们省却在脑海里再造出被各种信码描摹的原物所必须运用的理解和想象。

不过,就信息传播而言,最能证明科学技术对思维方式的变演有着催化作用的,还是网络媒介技术的出现与应用。计算机的逻辑运算模拟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使人的智能活动实现了机械化,人机交互设计带来的便捷使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新型网络媒介技术,当人们在网上接受和发送信息时,总是会以自我核心为实点参照,以大脑为初始虚拟折射平台,以网络信息为外部虚拟折射平台,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异

质同构式的“人—网”复合型思维方式。首先,它使思维与技术的双向互动较过往更加频密和强烈。一方面,它依靠自身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生发作用,使人的思维更加活跃高效;另一方面,人的思维能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使人在新技术运用的基础上不断去进行再革新再创造。其次,它使人的思维具有了更大的跳跃性,由于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人们在传输和接受文本时,不必严格遵循现实生活中的认知逻辑,相反还经常进行超时空的连接,这种有意无意省却中介的路径选择和实地操作,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识读能力,导致他们的思维在越过众多本应出现的环节时仍能保持连贯性和逻辑性。最后,它极大地促进了非线性思维的发展。由于它起源于无数终端的连接,这些终端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发送者,而且是信息的整合者和储存者,这样,在信息以何种状态作用于人的问题上,由它们连接而成的网络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多元、即时、多向等特征,使相关人士在处理信息时要同时以多种方式应对,从而使得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非线性思维。

经媒介技术赋能而导致的思维方式网络化同构倾向,并不止于人思维方式的变演,还可通过对群体认知结构的改变作用于社会心理,从而助长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影响。信息论认为,“思维是对新输入信息与脑内储存知识经验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心智操作过程”^[8],是人们能否正确认识思维、判断事物好坏的根本性因素。由于“网络化”思维具有种种优点和缺点,既有助于主流社会思潮个性化、多样化、多渠道及时传播,也在无形之中助长了错误思潮对民众思想的侵蚀。由于网络化思维的发展使得当代的人们擅长运用超链接式的碎片化阅读,而缺乏系统性的知识谱系建构,加之海量化的信息资源过载,极易使人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出现偏差,对社会群体的理性思维提出了较大考验。从广大网民的思维习惯和媒介使用情况来看,

网民阅读信息并不一定原原本本读完整篇文章或某个论坛中的全部帖子,而是阅读开头、最新的几页或者一些关键图片等,如对该内容感兴趣则通过检索关键词去搜索相类似的文章,从而达到对该话题的思维激活效应,并反映到对现实世界的所感、所思、所盼上。这种思维模式对于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相比传统媒介时代新认知激活而言时间大为缩短,存心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对人“思维”的异化,以“自由”“平等”“人权”等各式观念为号召,利用消息差,以断章取义式的真相建构和片面化的历史解读进行社会思潮的编码,以煽动、渗透、迎合民众人性深处的不合理、极端化的自我需要,消解民众的主流意识观念,使人们无法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而被所谓的“公知”“专家”等带跑带偏,从而使得多元繁杂的社会思潮网络传播成为可能。

三、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升压阀”:行为倾向的二元化呈现

行为是心理的外化表现,社会思潮在通过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大众的行为较从前有何变化呢?按网络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运行法则和节奏来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已成为不少人的行为特征。这样做,不仅使得他们将这一虚拟空间当成了自己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寄托,行为方式也与此紧密相连。马克思就非常精辟地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9]诚然,信息革命对人的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使得人的需要、思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使得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的行为除了受动机支配外,还包含着态度的意向成分,而这种意向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倾向。通常而言,人的存在从来都是通过其行为体现出来的。然而,人行为的产生却又是有条

件的,既要有内在动力的驱使,也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从传统意义方面理解,人们的行为从来都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是因现实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从自然的属性方面来讲是一元的。在网络技术出现和适用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网络展现给人们的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发挥作用,一切都可以被虚构出来,这样,便使得网络受众处在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局域之中。在这里,人们什么都可以说,也什么都可以做,放眼线上各处,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而这样做,表现在一个人自己身上,便是经由动作、声音和反应等表现出的现实行为外,又有了经由输入、下载、刷屏成就的虚拟行为;经由户籍等表现出的现实身份外,又有了经由IP、ID和账号等表现出的虚拟身份;经由物质及其运动表现出的现实世界之外,又有了一旦断网便一切不复存在的虚拟世界。于是,人们便有了两类行为、两重身份、两个世界。一个人不再是原先那种现实中一元的生命体,而是一个时而现实时而虚拟的二元存在。正是因此,可以说,网络技术对人的行为及支配其意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这一技术对人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使人的存在表现出线上线下两种形态,以致其性格亦具有了二元色彩。

迄今为止,尽管人们的生活仍以现实世界为主要存在空间,但由于网络媒介技术的运用,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已具有了线上线下两种模式。这样一来,他们便不断往返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便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呈现出二元境况并存且相互交错的特征,他们的心理也悄然发生变化。大量事实证明,在网络上,由于公共空间的准入门槛很低,尤其是身份的隐匿使得上网者减少了很多言谈上的顾虑,因此,人们对很多事物和现象的看法能在较少干预的情况下不断酝酿,最终“思而成潮”,极大地作用于网民的视听,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生活之

真伪是非的判认。尽管这里面也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如对话者身份的不分高下、话语权的充分享有,民主气氛非常浓郁。但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被有意模糊、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原则不被遵守、言谈时常突破道德底线甚至无视法律规范,等等。在这里,尤其需要看到的是,由于交往角色与身份在网上的转换非常便利,因此,个人交往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便很难落实,致使网络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有些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造谣生事,渲染社会负面情绪,“不惜去编造谎言,去吸引他人眼球。比较典型的有‘秦火火’‘立二拆四’事件等,他们杜撰的谎言主要有‘中国政府天价赔偿外籍旅客’‘张海迪为日本国籍’等”^[10]。正是由于不少网民在自己的存在方式上越来越表现出二元性,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很难通行的社会思潮在网络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并因为大众心理及人的行为倾向的这种变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散布机遇。此外,由于网络技术能帮助人们突破时空限制,结果使得他们因观点的相同而形成了现实世界中难以形成的社群,从而为某些社会思潮的滥觞提供了组织条件,“在短短几秒之内,数以百计的世界大众将会通过电子的手段而激活,众多的潜在虚拟大众社区分布于网络之上,这些虚拟大众的讨论主题多种多样”^[11]。每当重大突发事件、敏感问题和社会深层矛盾等出现时,无数网民就有可能迅速卷入其中形成社会心理上的广泛共鸣,并沿着“社会现实问题激发个体情绪表达、共同利益诉求促成人群积聚、在行为化与组织化中激化和固化集体意识”^[12]的路径发展壮大,从而形成对某种思潮的认同。

四、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涡轮器”:情绪状态的极化表达

人的情绪状态是一个人心理状态的直接反映。随着网络媒介社会的到来,社会文化形态由精英文化、审美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消费文

化,文化模式则由阅读文化转向“屏幕文化”。正如麦克卢汉笔下的“冷媒介”与“热媒介”概念,网络媒体时代的媒介是典型的“热媒介”,为人们提供的信息明确度高,受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思维参与程度低极易理解,与阅读时代相比无需太多的想象力。这种媒介形态下的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与提高了感官与情感的地位,而对于这两者的重视则导致大众逐渐远离了理性思考,使得网络时代的传播内容呈现情感先于事实的状态。有研究表明,“新浪微博并未构成一个对议题进行理性协商的‘公共领域’,相反,它成为人们宣泄愤怒等极化情绪的‘减压阀’,并且网民在情绪化的批评中充满了对群体利益对立面的妖魔化和恶意揣测。”^[13]对英国BBC论坛的研究也表明,“(负面)情感效价越高也即(负面)情感强度越强的话题其讨论时长越长,也即极化的情绪构成了网络讨论的‘燃料’,一旦这一燃料枯竭,网络讨论也就停止。”^[14]从国内的网络论坛来看同样如此,在百度贴吧、虎扑、豆瓣等平台上经常可以见到“友好交流”“理性探讨”等字眼,可见网络空间的理性探讨已然成为了一种奢望。

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与网络世界的运行机制相关,也离不开社会现实根源的影响。从网络世界的运行机制来看,一是网络世界身体的不在场性和匿名性避免了现实交流的冲突性紧张,为网络极端情绪的发生减轻了心理和道德负担,导致网络中各种极端话语和极端情绪可以毫无阻碍地宣泄而出,缺乏理性,而导致网络暴力情境的发生;二是网络世界的“去抑制性”使个体缺乏情绪的约束,涂尔干认为情绪既能产生团结也能导致野蛮,不能让情感得到无限制的表达,要借助道德力量来约束,而互联网却突破了这种限制,“互联网中的去抑制是指个体行动时对他人的评判和自我的呈现的关注和考虑急剧减少的现象”^[15],会使个体的行为和情绪表达失去外在的道德约束和内在的自我监督;三是“信息茧房”使网络用户过滤了同自己

意见和情感表达相左的信息,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个体在“信息茧房”中“不断接收和发布各种‘情感新闻’,同时其原先持有的观点、情感、情绪和意识形态也互相激荡和传染,不断得到强化和加强,与其他茧房的对立也变得十分尖锐,从而导致网络世界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和政治讨论以及情绪的极化”^[16];四是网络世界的“大众狂欢”现象导致集体欢腾,众多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网络世界的行动逻辑表述为“狂欢”,正如巴赫金所描述的那样,在常规的、严肃的、教条化日常生活之外,网络生活如同中世纪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7]。在互联网技术赋权和社会现实根源的双重影响下,网络为各阶层对利益冲突的反应与表达提供了平台,在允许个体情感无限宣泄的同时,又由于“茧房”效应只汲取与自己情绪、意见相同的信息,加之网络化思维导致的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主义现象,使得网络空间的情绪表达具有较为典型的冲动易变、轻信易感、情绪单极化的特点。对于社会思潮网络传播而言,民众情绪的上述特征显然将成为其利用的一点,当涉及社会公平、社会公权力、社会痛点等社会舆情时,一旦网络社会思潮利用民众的愤恨与不满情绪,将其作为网络讨论的“燃料”,有针对性戳社会的痛点来引导舆论,与此同时,非主流社会思潮也极有可能趁虚而入,趁民众有不满的情绪而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博取民众的认同。对于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治理而言,就必须重视网络世界这种情感倾向,在面对网络民众不良情绪时,宜疏不宜堵,要正面应对以满足民众合理的心理需求,让群众的情绪得到有效宣泄。

[参考文献]

- [1] 俞国良.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J].心

- 理与行为研究,2017(4):433-439.
- [2]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上海:三联书店,1962:272.
- [3] 潘菽.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新三界说[J].心理学报,1985(1):1-1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
- [5] 孙绍勇.消费主义的内在机理及其意识形态逻辑透析[J].理论学刊,2019(4):67-75.
- [6] 王娟,刘文雅.泛娱乐主义的审视与超越[J].思想教育研究,2020(11):62-66.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 [8] 刘颖,苏巧玲.医学心理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27.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 [10] 邹兴平.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因素影响力定量分析及引导策略[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0-68.
- [11] [美]约翰·帕夫利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M].周勇、张平锋、景刚,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84.
- [12] 彭庆红,刘迪翔.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20(12):78-82.
- [13] 潘霖,刘晖.公共空间还是减压阀?“北大雕像戴口罩”微博讨论中的归因、冲突与情感表达[J].国际新闻界,2014(11):19-33.
- [14] Chmiel A, Sien Kiewicz J, Thelwall M, et al. Collective Emotions Onlin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mmunity Life[J]. PLoS one, 2011, 6(7): e22207.
- [15] Joinson A N. Disinhibition and the Internet[A]// Gack-enbach, eds. Psychology and the Internet[M]. Burlington: Elsevier, 2007: 75.
- [16] Wright S, Street J. Democracy, Deliberation, and Design: The Case of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J]. New Media & Society, 2007, 9(5): 849-869.
- [17]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70.

(上接第61页)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无论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美丽中国建设,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保障了生态文明正义理念的落地生根。对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的诠释和正义问题的剖析,是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能更好地保障制度制定和运行的延续性、稳定性。生态文明制度正义的实现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顶层设计、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理念,代代相传,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0.
- [2]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 [3] 王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
- [4] 万俊人.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3):76-82.
- [5] 潘家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33.
- [6] 陈泽环.当代道德生活中的底线伦理[J].道德与文明,2010(1):22-26.
- [7] 何怀宏.底线伦理的概念、含义与方法[J].道德与文明,2010(1):17-21.
-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5.
- [9] 高健,丁炫凯.生态革命背景下环境伦理制度化正义诉求探究[J].理论导刊,2019(12):105-109.
- [10] 张钦朋.制度的正义功能及其实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72-76.
- [11] 陈芬,张琛琛.绿色发展的价值思考[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40-44.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